

乡村春晚在乡村社区文化治理与农村社会心理建设中的功能

谭啸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我国传统农村社会发展建设注重物质文化建设，对心理精神建设并不重视，常常存在“身有所栖但心无所寄”的现象，这些阻碍了乡村社区文化治理工作开展。本文以乡村社区文化治理为背景提出问题，创建乡村社区文化治理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再渗透农村社会心理建设与乡村春晚内容，选取案例分析某乡村春晚得多源流呈现状态，如文化源流、行政源流、乡土源流，介绍源流耦合作用。希望乡村春晚作为乡村社区文化治理工作中的精神文化重要媒介，在农村社会心理建设体系的大力辅助下发挥乡村春晚的应有精神文化功能，切实带动乡村社区文化治理工作向前发展，打造既注重物质文化建设，也注重心理精神建设的乡村文化社区，造福村民百姓。

关键词：乡村春晚；乡村社区文化治理；农村社会；心理建设；多源流

乡村社区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环节，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的突出难点。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地区的物质条件不断改善，但精神文明和心理健康的建设相对滞后，导致乡村社区在凝聚力、认同感以及文化活力方面出现不足。特别是在老龄化、少子化和劳动力流动加剧的背景下，农村社会心理问题日益突出，迫切需要通过有效的文化机制来加以缓解和引导。

近年来，乡村春晚作为一种新型的群众文化形式在各地蓬勃兴起，它不仅承载了农村社会的文化记忆和乡愁情感，也逐渐成为基层文化治理的重要抓手。乡村春晚以其全民参与、自我表达和集体共享的特征，为乡村社会提供了一个兼具娱乐性与教育性的舞台，成为文化治理与心理建设交汇的有效载体。

本文拟通过梳理乡村社区文化治理的理论逻辑，结合浙江丽水青田乡村春晚的实践案例，深入探讨乡村春晚在推动文化治理和心理建设中的功能，通过研究，希望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可操作的文化路径与心理治理模式。

一、乡村社区文化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分析框架

乡村社区文化治理在我国乡村振兴战略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它不仅关乎文化传承与创新，也直接关系到农村社会凝聚力与村民心理健康水平。长期以来，乡村社区治理更多聚焦在经济与物质层面，而在精神文明与心理文化层面则存在一定滞后性。随着农村社会的深刻变迁，文化治理的内涵逐渐被拓展至价

值认同、文化共享和心理建设等维度，亟需构建更加系统的理论逻辑与分析框架。

（一）合作生产理论的应用与启示

合作生产理论强调在公共服务供给中，政府、社会和个体需要形成合力，推动公共资源的共享与再分配。在乡村社区文化治理中，该理论的应用具有现实意义。一方面，农村文化建设所需资源有限，仅依靠政府难以全面满足村民的多样化需求；另一方面，农民作为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其主体性必须得到充分发挥。乡村春晚的出现正是合作生产理论的生动实践，村民通过自发组织、共同创作和积极参与，使文化治理由“政府包办”转变为“多方协同”。这种治理模式不仅提升了文化服务的可及性和多样性，也为农村社会心理建设提供了稳定的平台。

（二）多源流理论的引入与框架构建

在解释乡村春晚等文化治理现象时，多源流理论提供了有力的工具。文化源流、行政源流和乡土源流三者共同作用，构成了乡村社区文化治理的基本框架。文化源流强调传统文化与地方符号的延续，它是村民情感认同的重要纽带；行政源流则体现政府政策与制度供给的引导，是推动乡村春晚制度化发展的保障；乡土源流则根植于村庄社会网络和人情关系，是动员村民积极参与的动力机制。当三条源流在适当时机汇合，就会形成治理窗口，推动公共文化项目的生成与落地。乡村春晚的持续举办，正是这种多源流耦合的结果。

基金项目：浙江音乐学院 2022年度音乐学研究所开放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春晚”到“村晚”的转型与跨越》项目编号：

ZY2022M007。

（三）理论框架的现实意义

通过合作生产与多源流理论的结合，可以发现乡村社区文化治理并非单一的自上而下过程，而是政府引导、社会组织协同与村民自发参与的复合过程。乡村春晚作为典型案例，不仅反映了文化治理的多元逻辑，也揭示了农村社会心理建设与文化建设之间的紧密关系。其内在机制表明，唯有实现文化源流、行政源流和乡土源流的深度耦合，才能形成既有文化传承又具创新活力的乡村社区文化治理体系。

二、农村社会心理建设的困境与体系优化

在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心理问题日益凸显。人口流动、家庭结构变化以及社会关系重构，使农村社会面临心理失衡的风险。许多乡村呈现出“物质改善但心理失衡”的矛盾格局，亟须建立系统化的心理建设体系。

（一）风险防控的不足与挑战

在现实中，农村社会的心理风险防控体系尚未完善。由于老龄化和留守现象严重，大量老人和儿童缺乏社会支持，心理问题频发。例如，孤独感、代际矛盾、教育焦虑等现象在不少村庄普遍存在。加之心理服务资源稀缺，专业人才不足，使得风险防控缺乏有效机制，村民的心理需求得不到及时回应。

（二）服务功能的缺位与体系短板

现有心理服务体系多停留在形式化层面，治理与服务功能未能有效融合。一些心理服务点或辅导室虽然设立，但实际运作效率低，难以深入到村民的生活场景之中。许多村民对心理服务存在排斥或不信任态度，导致服务体系难以发挥预期作用。这种“设施有而功能弱”的现象，制约了农村社会心理建设的深入开展。

（三）嵌入与接受的偏差

根据学者的研究，心理服务在农村多表现为“弱嵌入—弱接受”的形态，即服务未能深入融入村民生活，同时村民的接受程度也有限。相较而言，乡村春晚作为文化活动，天然具备“强嵌入—强接受”的特质，它以节庆为契机，将心理教育寓于娱乐之中，容易被村民接受并内化。由此可见，优化农村心理服务体系，应当充分借助乡村春晚等文化载体，增强服务的渗透力与感染力。

（四）优化路径与制度创新

农村社会心理建设的体系优化，应从三个方面着手：其一，建立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村民参与的多元化格局；其二，推动心理服务功能与乡村文化建设的深度融合，将心理教育纳入日常文化活动中；其三，完善嵌入与接受的互动机制，

通过文化活动增强村民的心理认同与自我觉察。乡村春晚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路径，它以文化形式承载心理服务，既能缓解村民的心理压力，又能增强社会凝聚力。

三、乡村春晚在乡村社区文化治理中的功能实践

乡村春晚作为基层文化治理的重要形式，承载着凝聚人心、传播价值与促进社会融合的功能。以浙江丽水青田“乡村国际春晚”为例，可以清晰看到春晚在文化源流、行政源流和乡土源流的互动中所展现的多重作用。

在文化源流方面，青田春晚突出中西合璧的特色。活动中既有本土村民表演的百鸟灯和戏曲《穆桂英挂帅》，也有国际友人演唱歌曲和西班牙舞表演。中外元素的融合，既满足了村民对传统文化的守望，也凸显了侨乡开放包容的特质。春晚为村民和国际友人提供了共同交流的平台，使地方文化在传承中焕发新活力，并在跨文化互动中展现自信与认同。

在行政源流层面，当地政府为春晚提供了组织保障和制度支持，将其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并以其为展示侨乡文化的窗口。政府搭建平台不仅确保了活动的顺利开展，也通过年夜饭、拜年等环节传播了国家节日文化，增强了政策与民心的契合度。可以说，行政源流的嵌入，使春晚成为文化治理与社会治理相结合的重要渠道。

在乡土源流角度，村民的主体性发挥尤为明显。他们既是观众也是演员，自发创作节目并邀请外籍朋友参与其中，共同营造热闹的节日氛围。通过这种合作生产，村民的文化认同和社区凝聚力得到强化，而国际友人的加入则进一步拓展了乡村公共空间的开放度。这种互动不仅增强了村民的自豪感，也为跨文化理解与友好交流奠定了基础。

总体而言，青田“乡村国际春晚”展现了文化源流的多元表达、行政源流的制度保障和乡土源流的社会动员三者的耦合效应。它不仅丰富了村民的精神生活，也推动了社区文化治理的创新实践，使乡村春晚超越了节庆娱乐的范畴，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国际的重要平台。这一案例表明，乡村春晚在推动文化治理和促进社会融合中具有独特价值，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深远意义。

四、乡村春晚促进农村社会心理建设的作用与综合价值

在乡村社会转型与振兴的背景下，心理建设逐渐成为文化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农村社会普遍面临心理服务资源不足、社会支持体系薄弱、群

体孤独感上升等困境。乡村春晚作为一种兼具娱乐性与教育性的文化活动，不仅丰富了村民的精神生活，更在潜移默化中承担起心理疏导与社会整合的功能，成为促进农村社会心理建设的重要途径。

在春晚的组织过程中，政府、社会组织和村民形成了多元协作机制。政府提供政策与资金保障，社会力量与文艺精英贡献创意与专业支持，村民则以表演和参与的方式展现主体性。这种多方互动不仅推动了文化项目的落地，也通过集体参与增强了村民的价值认同与心理归属感，使心理建设不再停留于外部灌输，而是成为群体共同的实践过程。心理建设需要合适的文化载体才能深入人心，而春晚恰好通过文艺表演将心理教育融入娱乐活动之中。小品、歌舞或戏曲节目往往以家庭矛盾、代际沟通、留守问题为题材，在艺术化的呈现中传递理解、包容与互助的信息，帮助村民以轻松方式接受心理引导。与传统心理服务相比，春晚形式亲切、氛围活跃，能够激发更高的参与度和接受度。无论是老人、儿童还是外出务工人员，春晚都为他们提供了表达情感、寻求认同的平台。节目中的故事与角色让观众产生共鸣，从而缓解现实中的孤独与焦虑。尤其是留守群体，他们通过春晚找到与社区的情感纽带，在群体互动中增强存在感与价值感。它不仅是一次节庆活动，更是心理教育的常态化平台。春晚将心理服务融入文化治理，使村民在共同的节日仪式中获得心理疏导，同时也为政府与社会组织提供了观察和了解村民心理需求的窗口。这样一种制度化与群众性相结合的方式，有助于形成可持续的心理支持网络。

五、结语

综上所述，乡村春晚在农村社会心理建设中展现

了主体、载体、客体和体系延伸等多重功能。它通过文化活动凝聚人心，传播健康理念，回应现实问题，促进社会和谐。未来若能进一步提升制度化水平、扩大传播范围并增强专业支持，乡村春晚将成为农村心理建设的重要支点，为乡村振兴提供持久的精神动力与文化保障。

参考文献：

- [1] 汪三贵, 钟宇, 张艳姣. 住宅类型, 居住空间与搬迁家庭社区融入——基于8省16县微观数据的分析[J]. 农村经济, 2024(5):99–109.
- [2] 陈绍军, 唐滢. 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秩序重建的实践逻辑及反思[J]. 农村经济, 2024(3):75–90.
- [3] 姜韩, 王彬, 张高华.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群众体育赛事的多维价值, 制约因素与铺展路径——基于“村BA热”的思考[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24, 58(7):41–47.
- [4] 张自强, 何婕. 共同富裕目标下社区主导乡村旅游发展的逻辑与出路——以贵州省黔东南郎德苗寨为例[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24, 43(2):125–130.
- [5] 李军, 刘洋, 李军明. 西南民族村寨振兴的多元协同治理路径研究[J]. 广西民族研究, 2024(1):164–174.
- [6] 何志武, 陈天明. 因地制“仪”：新型农村社区的空间生产与乡村传播网络重构[J]. 编辑之友, 2024(1):75–83.
- [7] 唐伟杰, 赵晓峰. 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的障碍与进路——基于S省T村的案例分析[J]. 世界农业, 2024(3):91–98.
- [8] 孙九霞. 旅游发展驱动“和美乡村”建设：文化经济化与经济文化化[J]. 贵州社会科学, 2024(1):154–161.